

UAP及我国的现状

北京图书馆 邵文杰

- 一、UAP的概念及其提出
- 二、读者及其对出版物的需求
- 三、出版物的生产与供应
- 四、出版物的采访
- 五、馆际与国际互借
- 六、出版物的保存
- 七、结束语

一、UAP的概念及其提出

UAP是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的缩略语,过去曾译做国际图书馆资源共享、国际图书推广、世界图书普及、世界出版物收集和利用、出版物在世界范围内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国际出版物的适用性等等,但这些译法都不够准确,还是以直译为“出版物之普遍可用”为好。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在1980年它所编写的一个有关UAP的小册子中给UAP做了如下的定义:

“UAP是一个目标,也是一项计划。做为一个目标,最终要做到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在最大程度上向读者提供他所需要的出版物”。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对准确而又及时的信息有所需求,而出版物就是知识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所以UAP的实现是国家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和个人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为实现这一目标,UAP做为一项计划,不但要采取正面的措施,还必须采取措施排除障碍,这些措施应在从国内到国际各个水平上,从新资料的生产到出版物的保存各个阶段上进行”。所以UAP涉及作者、出版社、书商、

图书馆、情报中心、档案馆和其最终受益人——读者,也是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职责。

从上述UAP的涵义可以明显地看出从杜威的三R原则(在适当的时间、给适当的读者提供适当的图书、为最大多数读者以最低的花费提供最好的读物)、阮岗纳赞的图书馆五律(图书是为了用、每位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一个成长中的机体)一直到七十年代以来图书馆资源共享概念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

UAP的概念是1973年首先在IFLA内提出来的。当时针对国际互借工作的进展提出:“各国负有责任提供本国出版物以供馆际与国际互借使用,满足本国及国外读者需求”的要求。197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IFLA第40次年会上,决定建立IFLA的国际互借办公室。1975年在奥斯陆召开的第41次年会上,决定将UAP列为除世界书目管理(UBC)之外的又一项中期计划。到这时,UAP还是一项主要与图书馆国际互借及国际交换有关的计划。

1977年Maurice Line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前述涵义更加广泛的完整的UAP的概念。1978年在捷克Strbske Pleso召开的IFLA第44次年会上,UAP是主要的议题。Line的提法逐渐为国际图书馆界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决定对IFLA的UAP计划给以赞助,从1979年以来,一直列入UNESCO的年度资助项目。

我国最早接触UAP是1979年五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亚太地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

UAP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丁志刚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姜炳炘同志对这次会议做了报道,首先介绍了UAP的概念。

1982年五月UNESCO和IFLA联合主持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UAP大会,陆本瑞、邵文杰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检讨UAP的现状、前景展望、存在的困难与障碍,研究克服这些障碍所应采取的措施等”。会议对大会主要文件逐章进行了讨论,通过了最后报告,报告对UAP在各国及国际范围的实现提出了广泛的建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邵文杰同志于同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藏书建设专题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介绍。

1983年二月在英国Boston Spa,由IFLA召开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UAP研讨会,蒋凯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1984年在内罗毕召开了主要由非洲国家参加的UAP研讨会。

1985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了主要由亚洲国家参加的国际UAP研讨会,我国接到了邀请,但未能成行。

本文将以Line的文章、1982年国际UAP大会的主要文件为依据对UAP的主要内容做一介绍。

二、读者及其对出版物的需求

这里“出版物”(Publications)一词定义为“公众能使用的知识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它不仅包括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的印刷品,也包括缩微资料、机读资料等。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的飞跃进展,信息已经完全可以在电子计算机内贮存起来,并通过远距离通讯和各种终端设备直接传送给读者。西方有一种观念,认为传统出版物将为电子媒介所取代,这是不确切的,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在可以予见到的未来,出版物,尤其是传统的印刷品仍将是主要的知识载体。

这里的“读者”(user)一词,应译为使用者,因为对各种出版物不但要读、也要看、要听乃至要触摸,我们只是习惯上还称之为读者而已。

读者包括个人,也包括团体、政府机构等集体读者。读者不只包括出版物的实际使用者,也包括那些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诸原因不知道、不会、不能使用出版物的潜在读者(Potential reader)。

读者使用出版物的目的一般有:

- 1、为得到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业余教育、自学乃至应付各种考试;
- 2、为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制订规划,进行决策而收集情报;
- 3、为解决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 4、为了消遣、个人爱好。

在提供出版物上,读者方面的主要障碍在于:

- 1、文盲或文化水平低无使用出版物之要求或能力;
- 2、生活贫困,为衣食奔走,无暇或无经济能力使用出版物;
- 3、所在穷乡僻壤,交通、通讯不便,难以获得出版物;
- 4、语言障碍,缺少本民族语言的出版物;
- 5、不知道有何出版物可用,不会查找所需之出版物;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障碍主要是贫困与文盲。UAP的实现首先有赖于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和人民群众的文化普及。

出版界、图书馆和情报中心应该研究读者,包括可能的潜在读者的构成与分布,分析他们对出版物的需求和趋向,了解他们对出版物供应情况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工作。因为对出版社、图书馆、情报中心工作的价值,最终还是要以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读者对出版物的需求来衡量。

对读者进行出版物使用的教育是非常重

要的。不单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情报服务水平比较高的发达国家中,图书馆、情报中心文献的使用率也是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者不会使用出版物,不知如何查找文献。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书目情报不全,检索全靠手工,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所以,必须对读者进行使用出版物的教育,这一教育应该从在学校学习的阶段就着手进行。在我国一些高等理工科学学校的《科技情报检索基础》课程和一些高等文科学学校的《中、外文史工具书使用》课程等就是为此目的而开设的。一些图书馆和情报所也为读者举办了类似内容的讲座。

每个国家都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书店—图书馆—情报中心的服务网络,以保证本国各个区域,包括边远地区的居民都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出版物。

在我国,按照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各省、市、县都要逐步建立起公共图书馆。但是在1985年,全国2,069个县中只有百分之八十的县做到这一点,仍然有413个县没有图书馆,须要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去建立。就是在2,217个县以上的图书馆中,也有645个,由于馆藏和阅览座位太少而徒有其名。

由于我国图书馆与情报所分属不同系统,光是图书馆就有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科学院以及各部委等许多系统,由各自的条条块块领导,没有横向联合,所以全国的图书馆—情报所网络一直建立不起来、使UAP在全国范围乃至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实现都很困难。

对于儿童、残疾人和病人对出版物的需求要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也是UAP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出版物的生产与供应

出版物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对其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负有责任。书商则向公众或图书馆、情报中心销售这些出版

物。图书馆和情报中心是出版物的重要销售市场。UAP的实现与出版社、书商的产品及服务有很大关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5年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1983年全世界共出版772,000种新书,但其中六个国家(苏、美、西德、英、法、日)的出版物就占了将近50%,可以看出世界出版物主要集中在几个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甚少,只有百分之二十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出版物的生产与供应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遇到的困难有:

1、新技术的冲击,如各种形式声像资料机读资料的出现和普及、软件出版物的兴起以及印刷业中照排、电子计算机排字、销售工作中自动化的实现等等,书业界要做大量的资本更新。

2、由于通货膨胀,成本增加,书价上涨,销售量增加不多,利润降低,竞争激烈,整个书业界不够景气,许多中小型出版社为资金雄厚的大出版社甚至其它行业所兼并,为了争夺市场,大众市场书、连环画等廉价书充斥市场,比较严肃的作品由于售出册数少,书价高昂,出版受到限制。

而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则是:

1、对外国出版物的严重依赖,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发展中国家每年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大量图书,有的国家甚至学校的教材也靠进口,近年来书价猛涨,缺少硬通货外汇,无力进口图书。

2、纸张、油墨等印刷器材价格昂贵、印刷设备数量不足、印刷技术落后。国内缺少完善的出版、发行与销售系统,使出版物的生产与供应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后,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发展很快,尤其是近年以来,更取得了飞跃的进展。到1985年,全国每年出版新书已达45,600种,

印行66.7亿册,人均6册。每年出版新书种数居世界第五位,发行册数已居世界首位,而人均发行册数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出版事业十分繁荣兴旺。

全国416个出版社在提高出版质量、适应各类读者多层次的需求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出书的品种构成,已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学艺术各个学科门类、不同学术观点和流派的大量著述和译作,以及更大数量的普及读物。

杂志和报纸的出版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85年,全国正式登记出版的杂志共4,100种,全年总印数21亿册。1985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632种,平均期印数1.4亿份。

1982年我国对图书发行体制进行了改革并已取得了成效。全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以出版社自办发行和集体、个体书店书摊为补充的多渠道的图书发行网。到1985年底,全国各种经济形式的图书发行网点已有11万3千余处。1985年全行业图书销售达到61亿多册,销售金额33.4亿元。多年来,我国一直推行低书价的政策,大大减轻了图书购买者的经济负担。即使是因纸张价格上涨而调价后的书价仍远远低于国外。

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对国外出版物的需求日益增长。1985年我国用于进口国外出版物的拨款已达5千5百万美元,是1977年的6倍。在这一年我国还放松了对从国外以及台、港、澳地区进口图书和国内订购这些图书所做的某些限制,开辟了更多的图书进口渠道,大大地方便了国内用户。

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在图书的出版发行问题上也面临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类似的困难。

在本国出版物的出版与发行方面,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十分尖锐。

1、书刊印刷生产力不足、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全国16,000多个印刷厂(所),

95%的设备还是五十或六十年代装备起来的,几乎全部需要更新。排版仍是手工操作,印刷以凸印为主,装订大都是单机操作。印刷设备以及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品种、规格少,性能差,质量低,严重影响印刷质量的提高。

2、图书出版周期太长。从发排到出书,全国平均长达200天左右。北京、上海地区更长达一年到一年半,如我国最大的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平均为419天,有的甚至长达900天之多。有些书刊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这几年一些出版部门指导思想不端正,不考虑社会效果、出版了一些不健康的图书。而一些为两个文明建设所需要,有价值但获利不多的图书反而不能出版。

3、从1982年开始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发行网点少,仓库严重不足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善。在全国11万3千余发行网点中有8万多个是在供销社、国营商业及其它方面的售书点,再加上一万多集体、个人的书店、书摊,他们经销的图书范围很窄、数量有限。各级书店仓库几乎全部爆满。1985年由于原材料提价,书价与1984年相比涨价43%。上涨幅度较大,再加上新的发行体制还未能很好地协调,造成各地新华书店订货萎缩。存货量急剧增加。买书难与大量图书积压卖不出去的状况并存。

在外国出版物的进口方面,虽然国家用于进口图书的外汇近几年翻了几番。但由于国外书价的上涨(书每年约上涨15%,刊约40%),再加上外汇对人民币汇率的急剧上涨,用人民币支付的书价上涨幅度更大,而做为国外出版物主要购买者——图书馆和情报所,购书经费虽有所增加均赶不上书价的上涨,实际购书量减少。

长期以来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独家经营图书进口业务的局面已经被突破,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专营图书进口的企业,但缺少协调,彼此重复。而一些重要的、有价值

的图书资料又没有引进,长期以来图书进口企业管理落后,索佣太高而服务质量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编制我国出版物目录的重要性,因为要做到UAP,只有在知道了某一出版物确已出版后,才能去设法搞到并加以利用。向国内及国外读者提供本国图书出版的信息是实现UAP的必要条件。新华书店发行所印行的《社科新书目》与《科技新书目》还不能囊括我国出版的全部新书,而邮局的《报刊征订目录》所收入的报刊就更不全。对于非书、非刊的资料性文献、缩微资料、视听资料,则除了中国唱片报对唱片的出版有所报导外,其它都无信息报导。

四、出版物的采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的记载,六十年代全世界每年出版新书25万种、七十年代增至50万种以上,而到1983年如前所述已达77万种,增长速度很高,绝对数字很大,而由于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书价猛涨,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扩大、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读者对使用图书馆和情报中心藏书的需求与日俱增。因为新版图书,读者还可以在书店购得,而绝版书或因某种原因不愿或无法购得的新书,读者就只有求借于图书馆或情报中心了。

出版量猛增、书价上涨而需求却在增多,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情报中心,由于经费、空间、人力的限制,想做到“自给自足”不依靠别人而满足读者的全部需求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为了避免图书采访的遗漏或不必要的重复,制订一项全国性的图书采访政策就成为当务之急。当然,各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差别很大,这样一项政策以及为实施这一政策所应建立的全国图书采访体制就不可能有一种统一的格式。

对于本国出版物,各国应保证其能全

面,无遗漏的采集、入藏,至少是近期出版物,要能做到。即采访政策应立足于全部满足本国及国外读者对本国出版物的需求,或提供原件,或提供其复制件。不可能设想,本国出版物还要向外国去借。本国出版物的全面采访是在本国和在国际间实现UAP的出发点。

出版物的缴送制度是保证本国出版物全部入藏的条件。

早在1955年我国就着手建立了图书缴送制度,在这一年,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规定,凡是公开发行的书籍、图画、杂志,均应在出版后三日内由出版者缴送样本给出版事业管理局、北京图书馆等单位。1979年对该办法所做之修订,将收缴范围扩大到报纸,扩大到包括只限国内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所有出版物。

这个办法,从根本上保证了版本图书馆对我国出版物的入藏与保存,保证了北京图书馆对我国出版物的全面入藏和提供国内、外读者借阅使用。

但是这个办法还仅限于出版社供出售的出版物,不含机关团体、厂矿、高等学校的出版物,更不含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等声像资料。另外,由于我国还没有一整套“出版法”、“版权法”等法律,有的出版单位不知道甚至拒绝无偿提供缴送本,这不但使本国出版物入藏有遗漏,而且影响到全国新书目录和国家统一书目的编制。

至于外国出版物,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财力如何雄厚,也不可能做到全面收集。为了满足国内读者对外国出版物的需求,国际互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一般认为,如果能够做到70%的对外国出版物的需求可以在本国范围内解决就算不错了。

以上是就全国范围来讲,如单就每一个图书馆情报中心,除了接受缴送本做为馆藏的国家图书馆可以做到本国出版物的全部入藏外,别的图书馆或情报中心,无论是本国

还是外国出版物都不可能,也无必要全面入藏。因此各个图书馆、情报中心之间在采访工作上必须有适当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分工可以按:

- 1、学科或主题
- 2、出版物的形式
- 3、学术水平
- 4、语言或出版国
- 5、出版年

等不同而进行。

Stephen Vickers和Maurice Line 198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计划安排下,对实现UAP的国家计划(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印度等国)所做调查研究,提出了4种可以采取的模式:

1、全国建立一个采访中心,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包括其外借部)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它的采访政策在于它的藏书能补充全英各图书馆的藏书之不足,凡是别馆没有的书,都有最大可能从该馆借到。这种做法比较简单,无须在地方一级再做安排,但投资甚巨,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承担得起的。

同上,但由某馆兼任,如北欧有的国家就是由一个大学图书馆兼任的,适于发达国家中的小国。

2、集中在几个图书馆,譬如按学科分工集中在四、五个馆。各馆全面入藏所分工学科部门的图书。美国近似这种做法,除了国会图书馆之外,它还有国立医学图书馆、国立农业图书馆等三个国家图书馆。

3、按地区分配,即在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图书馆(或几个主要的图书馆)之间进行分工,或建立地区采访中心。缺点是全国范围内缺少统筹规划,复本率较高。幅员辽阔,交通、联系不便的国家往往采用这种模式。

4、分散采访,根据现状,不改变各馆本来的采访方针,对采访工作进行适当的协调,这是一种松散的体制。

当然也可能是以上这四种模式的混合,

也可能是超越国界,实现几个国家之间的采访协调,如北欧四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的《斯堪的亚计划》等。

我国早在1957年,国务院就批准并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负责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工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提出为了使图书馆藏书适当地集中和系统地积累,逐步达到丰富精专的地步,要在现有收藏基础较好的图书馆的基础上,成立若干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搞好全国图书馆的协调包括藏书协调工作。

当时成立了两个——北京、上海——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辽宁等若干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它们都相继开展了图书采访的协调活动,尤以外文期刊的采访协调活动收效显著,复本率大大下降、订购的品种增加,节约了宝贵的外汇。

北京的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包括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农业科学院图书馆、地质图书馆等,委员会研究了中心图书馆的分工,包括采购、互借、交换、调配等方面的分工合作。明确了北京图书馆应成为全国图书馆的藏书中心,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专业的科学图书馆(如医、农、地质图书馆)应成为全国基础科学、医学、农林和地质科学的藏书中心,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开放。与此同时,还就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藏书分工进行了协调,确定了由情报所全面入藏四大报告、专利、标准、产品说明书,图书馆一般不再入藏这些文献。

遗憾的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活动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以至完全瘫痪,机构解体,而且再也未能恢复起来。1976年以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图书采访的协调活动却至今仍未恢复。

1985年我国用于进口外国出版物的用款

已将近6千万美元之多,与七十年代相比,已经翻了几番,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是很小的一个数值。如联邦德国和日本每年都用约3亿美元进口图书,就是只有250万人口的新加坡去年也用了4千万美元。

国家用于图书馆的投资近年来也增加很快,以公共图书馆为例,1985年的总投资已超过了2亿元。这些投资用以购买图书、支付工资和行政开销,对于两千多个县以上的图书馆也是太少了。各馆普遍遇到经费拮据、空间紧张、人力不足的严重问题。

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采访政策,没有各图书馆——情报中心之间在藏书建设与图书采访上的分工协调,各单位“自给自足”思想相当严重。在采访工作上各行其是,使得各馆藏书形成一种“你有,我也有,你没有,大家都没有”的局面。在全国或一个地区范围内,许多重要的、有价值的图书大量漏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又互相重复,积压大量的复本,造成经费、空间和人力的浪费。

1985年国内、外出版物涨价甚多,各图书馆、情报所的购书经费虽均有所增加,但仍赶不上书价的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不得不压缩图书采访数量,甚至将多年延续不断的期刊也停止了订阅。这一事实推动了图书采访协调的重提。一些地区(如沈阳)、一些系统(如高教系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本地区、本系统内的协调活动。

五、馆际与国际互借

既然任何图书馆、情报中心都不能做到“自给自足”以全部满足其读者对出版物的需求,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赖于别馆的馆藏,馆际(指国内范围)与国际互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全国采访政策的制定和图书采访的分工协调如果没有相应的馆际与国际互借配合就会落空。

七十年代以来,“资源共享”思想逐渐

为人们所接受,馆际与国际互借发展很快。在这方面,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全世界图书馆界、情报界的注意。它所收到的外借或提供复制件的申请,到八十年代,每年已达三百多万件,其中85%,用它自己的馆藏就可以满足,其余15%再通过与别馆的馆际互借解决。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本国需求,在全世界各国的国际互借业务中,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也占有很高的份额。

但是在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情况就远非如此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馆际互借的规模很小甚至没有,即使开展了馆际互借,也是满足率低、供应速度慢、费用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 1、经费不足、缺少支付国际互借费用的外汇。
- 2、复制设备少、技术落后、熟练的技术人员不足。
- 3、版权法对文献复制所做的限制。
- 4、没有相应的书目情报、查找不到读者要借的文献。
- 5、办事效率不高、工作拖拉等。

在建立一个全国的图书采访体系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起一个相应的全国的馆际互借体系。全国馆际互借体系也有四种模式可供选择:

1、把全部或主要的馆际互借业务集中于一个中心馆,即各馆的馆际互借均向该馆提出,该馆应大部分能够满足,满足不了的,再向别的馆乃至向国外提出,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就是这种模式。

2、将馆际互借业务集中于几个中心馆。

3、将馆际互借业务,按地区或学科有计划的分散给几个馆。

4、各馆自行调节,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建立馆际互借关系。

考查馆际互借工作的好坏主要从三个方面:

1、满足率——从全国范围来讲，对国内读者的需求最少应能满足70%，不能再低于这个水平。从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1983年所做调查来看，馆藏7,500种常用期刊即可满足读者需求的80%，但是要达到90%的满足率，馆藏期刊种数就要12,000种。在一国范围内，对本国出版物的需求，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应以100%满足率为目的，对外国出版物的需求，则100%的满足率不仅耗资甚巨，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

2、供应速度——如果在接到馆际互借申请的图书馆自身就有要借的这本书，很快查到，并且没有借出，互借手续简便，工作没有拖拉，这项申请很快就能得到满足，像不列颠图书馆一、两天内就可以将要借的书发出。

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顺利，书发出后，邮寄的时间更与路途是否遥远，邮递工作效率高低有关，而这些因素是图书馆员所难以控制的。国内的馆际互借一般要一至三个星期才能收到要借的图书，而国际互借往往要几个月才行。

3、费用——馆际互借的费用包括包装、邮费、劳务费（有些图书馆不计在内），在不能提供原件情况下，还应包括复制费。如果有双边的馆际互借关系，有往有来，并大体平衡，可互不索取费用。如果不能平衡，任何图书馆都无力单方长期承担开支。仍以不列颠图书馆为例，它出售国际互借用的申请单（forms）每本有20张，索价200美元、复制用代价卷（Coupons），每本20张，索价90美元，均需用外汇支付。

我国的馆际互借工作还处于比较低水平的阶段。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全国性和地方性中心图书馆的建立，在各种类型图书馆之间以及在图书馆和情报所之间除了在图书采访上进行协调之外，也推进了馆际互借工作的开展，这项工作后来停顿，到80年代又逐步恢复起来。

近年来，国内一些地区的图书馆、情报所之间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参加这一网络的图书馆都发有一个馆际互借证，各馆凭此证可以到别的成员馆那里借书以提供本馆读者使用。

北京图书馆做为国家图书馆正在成为全国的馆际互借中心。和北京图书馆已经直接建立馆际互借关系的国内各系统图书馆、情报所，到1985年已有902个，每年处理的国内馆际互借约1万件左右。

北京图书馆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图书馆已经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等五十多个外国图书馆建立了国际互借关系，成为我国国际互借的中心。国内各馆在国内借不到的出版物，可以通过北京图书馆向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外借部等外国图书馆进行国际互借。

但是不管是国内或国际馆际互借，其规模仍然很小，尤其是国际互借，以北京图书馆为例1985年处理的国际互借仅三百多份。而且是国内申请远远低于国外申请。

最近几年，计算机情报检索，尤其是国际联机检索终端的建立，我国已经可以使用ESA，DIALOG大型文献数据库，但这只解决了情报源的查找，而原文的提供很难，由于国内各图书馆、情报所馆藏有限，一般只能查到30~40%。国内读者对国内未藏的这部份外国出版物的需求，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国际互借来解决。

在我国开展国内和国际互借业务的主要困难在于：

1、缺少联合目录——馆际互借的申请要求助于别馆，由于缺少联合目录，根本无法查到文献在哪儿，互借的申请无门可投。

2、资金不足——现在国内的馆际互借一般不索费，无偿提供服务，各馆由于经费有限，无力扩大规模。而国际互借，一般均索费，且需用外汇支付，各馆更没条件开展。

3、缺少训练有素的馆际与国际互借图书

馆员。

4、复制设备不足、技术落后、缺少熟练的复制技术工人。

六、出版物的保存

读者可以通过商业途径从书店直接购得新版图书，但新版图书过若干年（譬如两、三年）后就是从旧书店也往往很难买到，这时读者对出版物的需求主要靠图书馆来满足。图书馆不仅收集图书，而且把图书长期保存起来并提供读者使用。情报所与图书馆不同，它收集出版物，用以加工、整理情报，也提供读者使用，但一般不长期保存。

缴送制度是保证本国出版物全部入藏的条件，但入藏并不等于能够长期保存下来，长期提供读者使用。近几年来有两件事严重的影响了出版物的保存。

1、本世纪以来造纸业广泛使用的酸性造纸法，使纸张的酸度很高，保存几十年以后就发黄、变脆，翻动时即碎成小片，落到地面，称为“黄雪”。再加上在使用过程中损坏、丢失，很多图书迅速损失，已无法挽救。

2、由于空间紧张，许多图书馆为了腾出空间，大量剔除旧书，许多旧书剔除后随意处理，甚至化做纸浆重新造纸。

这样，不少出版物，其中有些可能是一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珍宝就面临永远丧失的危险，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所以光有缴送制度、有正确的全国采访政策还不够，各国还必须有完善的全国保存政策并加以实施，才能不但保证出版物的入藏，而且能够长期保存下来，长期向本国或国外读者提供借阅或复制件。

和图书采访、馆际互借类似，全国的出版物保存体制也有四种模式：

1、建立全国性的保存馆，按照规定的范围（如某一年限以前出版的图书，或某一年限内未曾使用过的图书等）收进各馆剔除

的图书。

2、建立全国性的保存馆，但不规定严格的收进范围，各馆可以将自己认为应该剔除的图书发送给保存馆，由保存馆决定这些图书是否保存。

3、按地理区域建立保存馆，在一个区域内保存图书。

4、分散保存，即各馆之间对图书保存进行分工，各馆分别建立自己的保存书库。

苏联有全苏、加盟共和国、地区间、地区四级保存馆，按照不同的范围保存图书。美国有地区性的，如设在芝加哥的中西部地区图书馆馆际中心（MILC）的保存馆，收进各成员馆移送的图书。

各馆将多余的复本以及陈旧过时或流通率极低的“呆滞图书”移送给保存馆，就大大缓和了各馆书库空间紧张的状况，从而提高藏书的利用率。保存馆可以将需要长期保存的图书以密集方式存放，节约了空间，还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保护图书，延长图书的寿命，一旦需要即可提出使用。多余的，决定不集中保存的图书，则可以用来供各馆之间调剂或交换使用。

为了防止大量图书迅速损坏，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对破损的图书要及时修补、裱糊、装订，书库要符合防火、防虫、鼠以及防潮等基本要求，但是当前对出版物的最大威胁还是酸性纸的脆化破碎。大规模的如在宇航试验舱中用二乙基锌进行脱酸处理，从技术上已经解决，但成本太高、未能推广使用。

在我国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图书抢救计划，即把那些珍贵的古籍、善本和面临损坏的旧书、刊、报纸进行缩微复制，以图能将文献保存下来，但所费甚巨，而且工作量太大，以现有的人力与技术装备进行，到下世纪初也无法完成。目前只能选择其重要、有损失掉危险的抢先进行。

光盘技术是七十年代兴起的一项新技

术,和缩微、磁盘一样也是一种数据文献存储手段,但是它的存储量很大,一张30厘米直径的光盘就可存储1~5万页文献。在美国曾有人断言缩微复制将为光盘技术所取代,实际上光盘技术仍处于开发阶段,如它价格较贵、保存期较短,仍须进一步完善。

七、结束语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实现UAP,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其字面意义来讲,UAP的最终目的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但只要我们前进,我们就会离这一目的地越近,正如Maurice Line所说“骆驼虽然走得慢,但是在前进”。

为了使UAP不致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就必须在出版物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阶段,从国内到国际各个水平上采取实际可行的具体措施,除了出版社、图书馆、情报中心这些基本单位外,各国主管图书馆—情报中心事业、出版事业的行政机构,各国的出版者协会、图书馆、情报协会等负有很重要的责任,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UNISIST)等在国际范围上

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 1、“国际图书馆资源共享计划的由来和发展” 姜炳所编译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北京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部合编:《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参考资料》,1981年7月
- 2,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Universal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Paris,3-7May 1982,Main Working Document,UNESCO,IFLA,Paris,1982,
- 3,同2:Final Report
- 4,Stephen G.J.Vickers and Maurice Line:Guide lines for National Planning for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AP,British Library Lending Division,1983
- 5,同上:Improving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Model National Systems,IFLA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for UAP, British Library Lending Division,1984
- 6,IFLA 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UAP: Guid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Meetings on UAP,UNESCO,1985

(上接第22页)

用功利主义眼光看待学术研究,停留在具体工作环节的研究中,对微观现实问题研究很重视。但是,对宏观现实问题,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组织管理、体制、发展战略、发展趋势等等,非常薄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研究成果之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实属少见。研究基础理论的同志不重视现

实问题研究,具体应用研究同志不关心全局性的课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造成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吧!改变这一状况,是当前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个迫切的任务。

• 本文为1986年5月武大图书情报学研讨会上的论文材料,发表时未经本人校阅 — 编注

Summary

UAP in China

From 12 to 16 June, 1986 a National Seminar on UAP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Publishers,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s who came from 23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ll over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43 reports were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Among them Mr. Shao's report entitled "UAP in China" was taken as the major one.

Shao provide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AP in China. Repor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bjective and scope of UAP. Following contents consist of five parts — users and their needs for publications,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publications, acquisiti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lending, reten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publication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sp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UAP. Bu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AP,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Constraints and obstacles are identified. To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ations, appropriate measures are being adopted. (page 23)

A research on the earliest foreign languages translations of "Hau Ki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The novel, Hao Qiu Zhuan, in eighteen chapters, was publish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a tale of the marriage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 Tie Zhong Yu and Shui Bin Xing. Although it is very lightly esteemed by scholars in our country, yet it was once frequently commended by foreigners in Europe and repeatedly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during the past centuries.

Nobody can definitely tell who the translator was or which original version, the Chinese or the Portuguese, the translator based upon, but it is still considered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 or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age 66)

Contemplations on building up library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era

The article describes a change from critical to constructional attitude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some new values of theory and ways of thought be establ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page 75)

O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regarding Mao Yi's first four collations of the famous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Shuo Wen Jie Zi"

Based on his research, the author refutes the inference upon untrue evidences